

我的深圳地理

□吴君



吴君,鲁迅文学院第二十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现居深圳,在《人民文学》《十月》等发表多篇作品,部分作品入选《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小说月报》及各类选本、排行榜。出版有《我们不是一个人类》《不要爱我》《有年代》《天越冷越好》《亲爱的深圳》(二区到六区)等,中篇小说《亲爱的深圳》被改编为电影,曾获《小说选刊》首届中国小说双年奖、第十五届《小说月报》百花奖、广东省鲁迅文艺奖等。

我的写作并无特别之处,喜欢阅读,便有了尝试,根据自己的意愿把深圳这座让我又爱又恨的城市写进了小说,并一直没有停止。当然,在我看来,这么做无比明智,因为它们正不断发酵、分解、变化,自上而下,由内而外,无法阻挡,这座城市在我的心里快要承载不下。当然,这期间我有过迷茫、浮躁和孤独无助的时刻。这些不良的情绪让我纠结了太久太久,据守或是远离一直在拷问着我这个居住在经济特区却要偏执于文学、天姿平平的业余选手,要不要频繁地出没于各式各样的活动,以此证明自己的才华没有枯竭,机会没有错过,要不要用出书的数量去稳固在线的形象都是我的焦虑所在。

直到有次翻看《北京文学》,和以往不同,我被封二吸引了。那是一个大腕云集的笔会,有几个还是我喜欢的作家。此刻,他们不再年轻的容貌吸引着我。看过合影之后,我突然明白了一些事情,原来这个社会没有因为你是作家就给你开了另一扇大门,也没有更多的便利和捷径等着身为女性的写作之人,走到塔尖上的人,绝不可能只靠巴结、讨好。它需要你更加勤奋、用功,更加心无旁骛。文学看似感性,实则枯燥无比,绝非装饰品,任何时候都可以戴在头上的招摇。它既是一件妙处难与君说的苦事,更是一份痛也无人分担的苦差,没有生活和知识的储备,不会走太远。匆忙上路,没有经济做保障,定会心生焦虑,从而影响一个作家的正常发挥。和所有手艺人一样,不断磨砺自己的内心和写作技术,同时还要和其他人一样,面对生活给我们出的一道道难题。只有拥有了成熟和健康的身心,才不至于在这漫长的征途中退出。即便是那些当红而实力派的作家大多已是中年,也绝非美女。之前他们写了10年,甚至是几十年。他们的成功绝非偶然,也不是一时运气,而是经历了几十年的点灯熬油,漫漫长

夜。原来,每个人都不得俯首向生活做出各种妥协,直至不再年轻,不再激情,老天才把成功的秘籍交给你。

比起那些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我这个外省人,不仅入侵,让他们的男女比例更加失调,还要改写、臆想出太多深圳故事。主人公有的埋首于流水线,有的沉迷于歌舞酒色,有的在家中寂寞,有的在路上徘徊,形形色色,他们何尝不是我,我又何尝不在体会他们的人生。瓦解本地人的津津乐道,质疑他们虚构的美景,不断用盲人的方法触摸自己心中的大象,并重新建构出一个更新、更多元、更加瑰丽也更加另类的城市,是我追求的境遇。于是,我顺从并服务于内心,如反映将青春与热血献给了深圳的农民工,最后却与幸福失之交臂的《亲爱的深圳》《菊花香》《扑扑息痛》《陈俊生大道》《深圳西北角》;男女比例失调错位的《十二条》《恋上你的床》《关外》《百花二路》,反映深港双城生活的《皇后大道》《东门故事》……

深圳,它牵动了太多人,改变过太多命运,照亮过许多人的夜空,是开放的前沿、实验田、理想者的圣地,也是世界的加工厂,暴发户、偷渡仔、寻租客们的乐土。这30年,它源源不断向社会学家贡献各种有效的课题,同时为作家提供了最丰富最极端的创作资源。由此而创作的深圳系列,既是我内心进化或后退的斑驳历程,更是这沧海桑田中的一个微观景区。安静下来,体味这些貌似日常却又惊心动魄百味杂陈的生活,多一些个人的思考和判断,而不仅仅是记录一些浮光掠影的城市的标识,是我常常提醒自己需要注意的问题。在我看来,只有这样,我才没有白写,更没有辜负这座令我情到深处的城市。

■印象

顽强书写外省人的心灵史

□冉正万

几年前,我和吴君有过一次很长的对话。我们就写作本身设定边界的探讨,驱散了写作带来的孤独与惊悚。对写作之外、作品的存在乱谈各自看法,使我感到了些许希望。这份希望是吴君的清醒带给我的。她的清醒让我至今难忘。当时,每天要看十几万字来稿,不时还翻阅到手的文学期刊,对整个中国的文学状况还是比较了解的。我对那种你有我有大家有的同质化写作感到很厌烦。吴君说,必须想好自己应该怎么写,不要去管其他,无论是做刊物还是写作,需要坚持到极致。现在,焦虑和不满荡然无存,我完全理解了作品的命数和作者的命运,并且坚定地认为,坚持不一定能在文学版图上占有一席之地,不坚持注定销声匿迹。这些观念和吴君的清醒不无关系。

吴君的清醒在她的作品中,是以呈现此在的精彩和无奈呈现出来的。

在那次对话不久,我编了她的短篇《花朵》,中篇《岗厦》以及后来的中篇小说《樟木头》。《樟木头》写的是两个女人为了获得深圳户口,遭受的羞辱和磨难。因为她们被看守所羁押过,她们的种种努力成了看得见目标,却始终难以到达、陷入越来越无助的尴尬境地。这种尴尬从外表看来不出来,尴尬程度只有她们自己知道。甚至,连她们自己也不知道。她们自己知道的,仅仅是不时涌上心头的烦恼。真正的尴尬其实时时刻刻在等着她们,给她们不致命但无比冰凉的一击。这冰凉的一击让读者感同身受。当然,这样的书写未免太过粗糙太过原始也太过不优雅。然而吴君的选择是令人钦佩的,她自始至终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

此在对个人而言是残酷的,具体的,并且是不便说出来的。所谓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能与人言无二三。这不便与人道出的七八九,正是小说面对的此在,也是小说为读者呈现的确凿证据,是我们不愿经受却不得不经受的痛苦和遭际。此在既是作家个人的,又是人类共同的,是作家的感受与感知,也是生活的本质属性。这些感受只有写成小说,才能够透彻地展示此在的残酷和魅力。

后来又读了她的小说《十二条》,我是在出差途中读到这部小说的,读完后我写了这样的话:小说闪烁着阴柔的光芒,这光芒照见了我们不便说出却时刻背负着的可怜巴巴的进取心。小说中的曹丹丹和江艳萍,她们都有着不屈的生命力,一方面,她们努力地活着,与此同时,却总是希望活出属于自己的价值。这种价值在外人面前是微不足道的,甚至是莫名其妙的,更可怕的是,她们希望这种价值既属于自己,又能展现在身体之外。作品在浓缩并剔除了大量的材料后实现了小说的内在张力。在诉诸于生命直觉中,同时能看到作者如何理性地看待生活,把曹丹丹和江艳萍的困境放到社会生活中去追问,而不仅仅限于她们的性格,这就实现了小说大于文本的意图。

吴君的深圳想象和移民书写

□谭杰

改革开放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带动城市建设迅速崛起,都市物质和文明迅猛发展,逐渐打破了中国乡村文明和乡土情怀占主流的文学格局,同时也赋予了当下文学作品更广阔的耕作疆域和天马行空的想象空间。由此,以书写都市风貌、生活形态以及生活在其中的个体形象的城市文学逐渐代当下文学叙事,如王安忆和她的上海书写,而作为中国最早的经济特区和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深圳不仅仅造就着时代的弄潮儿,更是中国最典型的移民城市,拥有独特多样、复杂丰腴的文化。然而,不同于北京、上海、广州这类有着较为厚重的历史和积淀的城市,深圳仅仅是一座有着30多年现代都市文化脉络的新城市,首先,城市面貌本身处于日新月异的变化之中,其次,生活在其中的人来自天南海北,鱼龙混杂,具有一种孤独漂泊的无根感。这些特点使得深圳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也有着最变幻莫测的世俗人情和城市属性,同时,也造就了深圳文学的独特的“新”。中国新时期文学中,深圳文学在某些领域表现出超前的觉醒,比如彰显打工问题、劳资冲突、城市青少年独立意识等作品。客居在此十余年的作家吴君,独树一帜地将写作视野聚焦在都市深圳移民的浮沉境遇,她将自身的内部经验——虚构莫测的都市生活交织杂糅东北农村生活的记忆——付诸笔端,揭示深圳都市移民的身份认同和艰难求生,以及现代化进程和文明冲突中的复杂扭曲的人性。

都市移民的叙事伦理：关于内部经验和内心风暴

不难发现,吴君的小说题目带有一定的规律性,或带有明显的经纬位置 and 地域特质,如《皇后大道》《深圳西北角》《岗厦14号》《二区到六区》《地铁五号线》《十二条》等;或充满着我们所熟知的生活中常见的气味,如《樟木头》《菊花香》《黄花》等;或是以病症、药品命名,以对症下药,直指要害,如《扑扑息痛》《复方穿心莲》《福尔马林汤》《牛黄解毒》等。综观吴君的创作,她的小说无不从生活的细枝末节中来,文本中的日常片段、言语对白、饮食男女等鲜活、逼真又带有些许的陌生化和新鲜感,充满了烟火气息和生命野性。

吴君的移民叙事不探究生命感觉的一般法则和人所遵循的基本道德观念,而是作家将自身的内部经验和内心风暴,灌注在移民个体身上,通过他们的生活片段和故事,提出关于生存和生命的问题,营构具体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诉求。作家用一种冷静、客观的叙述口吻和情绪,将某种价值观念的生命感觉在叙事中呈现为独特的个人命运。

吴君曾在访谈中提到:“一次移民,终生移民,后代也多是移民的命运,他们的内心很难安定下来,精神是躁动的。”移民生活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人性中原本沉睡的东西,比如欲望、恶癖,当然也有顿悟和觉醒,它所带来的对人格和命运的影响是终生无法消除的。吴君的小说多聚焦城市一隅,窥探整个都市移民混杂多变的生存状态,然而,在对这些现象进行层层盘剥时,作家又如一个冷静老练的外科医生,不带入多余的个人情感,而是通过文字,让读者感知其隐忍的痛感和柔软体恤的温情。

在吴君的小说中,我们还可以轻易发现,她习惯提供两个地域、两种价值标准对照这样一种二元结构模式。比如从东北到深圳,从关外到深南大道,从深圳到北京,从香港到深圳等等,小说中的人从一个地方流动到另一个地方,看起来是为了更高的生活理想和人生追求,实际上,这每一次生命轨迹的迁徙都是欲望和利益的迁徙,没有定性的生活赋予了人无限的可能,也给人性和人的张力展现提供了可能。《十二条》中的曹丹丹,对爱情、生活有自己的理解和把握,心底的愿望是能够在北京住上一段时间,像北京人一样过最日常的生活,使得在深圳失衡的内心得到短暂麻醉。小说的最后,江艳萍离开深圳回到北京——她从小就拼命远离的地方,她觉得北京人都是那么有文化。《念奴娇》中从东北搬到深圳的慈祥的母亲,完全变了个样,撞撞哥哥跟有文化的嫂子离婚,找个富豪,好过上衣食无忧的富足生活。城市生活以其滴水穿石的功力,渐渐扭曲了为了各种目的奔赴而来的人心,理想和现实的双重挤压,更烘托出城市移民精神世界的荒芜。

吴君的叙述并没有单纯地停留在底层生活的简单描绘上,而是直面人心和世情,用犀利精准的文字,剖开看似华丽体面的都市生活,直指症结所

在。《亲爱的深圳》中,都市白领张曼丽举手投足之间俨然忘记了自已也是农村出身,“倒霉哩,差点撞上一个农民”,“你们这些农村人……我看你们简直就是个残酷”……还有带有作者旁白性质的“在深圳人眼里,谁都没想过这些农村人也会结婚、生孩子,似乎他们压根儿就是一些没有性别的人”,“上班的时候,就像一个只有眼珠会动的机器人。似乎只有了下班……他们才变成活物……”这些描写无不透射出城市农村劳动者的存在感全无和卑贱地位,没有温度的城市生活让人生活在其间的人也变得冰冷无情。“身份”、“户口”是她小说中出现率最高的词汇,这两个词常挂在城市移民的嘴边,是他们最在意、最迫切的愿望,形形色色的中下层劳动者——保安、农民、女性,来到都市,他们路上的不只是求生之路,更是确立身份的艰辛之路。

都市移民的众生相：“我们不是一个人类”

在吴君的作品中,着墨最多的,也是最触动读者的,不在都市建设和生产的现场,而是蝼蚁一般生存的移民群体。在此,吴君着力捕捉的并非是酒吧、咖啡厅等高档娱乐场所这样浮光掠影的现代都市符号,而是徘徊在都市高楼间、蜷身偏仄空间里的身份卑微的底层劳动者的尴尬都市生活。吴君很少采用批判现实主义的写法,并不平铺或者直斥都市劳动者的苦难和悲痛,而是温情冷峻地指向人心深处,通过他们在都市的生存困境来凸显城市现代性过程中人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对深圳抱有理想的不仅仅是知识分子、白领,还有农民。深圳把太多人变成了外省人。移民到此的每个人,无一例外,命运都在不同程度发生了变化。背井离乡的人,心怀梦想的人,不甘寂寞的人汇聚在一起,产生了新的能量。这些能最有的转换为创新的原动力,有的转换为成尔虞我诈的利益之争,有的则化为旋转在城市上空的漫天风沙。”

过客型移民。这类移民带着梦想来到城市,在一番挣扎之后又离开。这类移民以男性为主。他们的内心经历了一个对城市向往、期待向矛盾、焦虑、无所适从的复杂转变。《念奴娇》中的父亲,寻租女儿来到深圳,却从此变

得不再喜欢说话了,总是安静地发呆。最终,他留下杨亚梅用身体交易换来的名牌手表,带着从东北老家带来的东西回东北去了。《亲爱的深圳》中的泥水工李水库,来到深圳的初衷是带在此打工两年的妻子程小桂回乡下老家生孩子,过日子,这让他并没有像其他城市移民一样沉醉淘金梦而迷恋大都市。初到城市的他并没有表现出对这座城市的兴趣,他眼里的大楼冒着寒光,让他不踏实,楼里的电梯“更是可怕,只一秒就让人没了根”。他说话都是小声小气的,像没着没落的城市孤儿。尽管他也有偷窥别人信件,把女白领当做性幻想对象这样人性阴暗面,也努力想引起这座高级写字楼里其他女性的注意,以期获得认同……他也发现了深圳的一点好处——随处可见让他无比羡慕的男人和漂亮的女人,他们说话得体,穿着整齐,这里是“神仙住的地方”。然而,看到路边等活儿的劳力,他也对这些人的愁苦感同身受。他鼓足勇气去跟张曼丽坦白自己所犯的不可弥补的错——他为自己手撕信而致使父亲没钱医治最终死亡的事情度日如年——在张曼丽看来,这错却恰好帮她甩掉了沉重的负担……城市的浮华并没有让李水库丧失乡下人单纯质朴的品性,他内心深处对自己的身份和处境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

艰难扎根型移民。《复方穿心莲》中北妹方小红看起来似乎是移民大军中幸运的一员——她通过婚姻进入到深圳本地人的家庭,但这令人羡慕的扎根是充满荆棘的扭曲变态的生活。她们为了扎根,尝遍艰辛,扎根后的生活没有带给她们多少抚慰,未来的生活依旧是灰暗无望的。

挣扎求生型移民。深圳的移民群体中,女性表现出了特有的韧劲儿,她们不惜代价,甚至舍弃亲情、尊严、贞洁,目的就是要在都市立足、扎根。《亲爱的深圳》中的光鲜白领张曼丽保持高冷的姿态游走在都市。她眼里似乎只有两种人,对她有帮助的和不相关的。她可以对帮她搬东西的保安英语燕燕,却对家中病重的老父亲避之不及,甚至他的死让她觉得解脱——她为自己捏造了一个处于中上层社会的家庭,因为这让她能够在都市中光鲜立足,受人高看。她努力与自己贫苦艰难的过往人生划清界限,但是她抹不掉那段岁月在她身体上留下的痕迹,

“外表光鲜,苦在里面”。离家出走到深圳打工的程小桂,努力学习都市人的口音、生活方式,并以自己越来越像城里人为傲。为了保住得来不易的写字楼保洁工作,她回避与丈夫李水库的关系,甚至言行中充满了对他的鄙夷;她教丈夫如何放弃夫妻孩子,以获取深圳人的身份,成为名正言顺的城里人……都市中女性绝情、自私的一面展露无遗,然而,小说的最后,作者转用饱含柔情的笔触,剥掉程小桂坚硬的外壳,露出她被城市割裂的伤痕累累的身体和心灵,以此又唤醒读者重新认识到那个人物作为女性弱势的一面,使得小说前面耗费大篇幅塑造出的那个坚硬的女性形象变得有血有肉,生动起来——都市不给予任何人喘息和脆弱的机会,适者生存是惟一的法则。《念奴娇》中,为了供哥哥读书,皮艳娟只身一人来到南方打工。打工生活的辛苦,小说用了一句话带过,“想家的时候,她会哭。直到哥哥没了工作,全家人也来到这座城市,她才不哭了。”被包养的日子让她获得了短暂的轻松和幸福,也很快就让她失去了所有。在这个冷酷的都市,她想尽办法给哥哥安排工作,得到的依然是全家充满势利的理想。带有报复性的,她拉嫂子杨亚梅走上了从陪酒陪唱歌到被包养的路。小说的最后,留下的是一声长叹,为看不到未来,靠那一点不光彩却又仅是仅有的温情的回忆度日的皮艳娟,也为这个都市中艰难反抗又不得不屈服的那些女性。

作为女性作家,吴君长于细腻的观察,精微的描写,但她的叙述并不软绵,而是偏于冷静雕琢,尤其是对人物心理的描述,每一处细微的波澜都暴露无遗。她从不规避人性的卑微和丑陋,甚至有些刻意解剖,但是她写作的目的,比起批判现实,更重于寻根究底,试图寻找都市个体生存的途径和慰藉的方式。她的小说,如同在喧嚣中静心屏息,打开蒙上纤尘的抽屉,取出的尚带有记忆温度的物件,引人深省,又不胜唏嘘。吴君是一位非常真诚而又执著的作者,我们读她的文本,能感受到生命个体的每一丝细微的疼痛和颤抖,以及她对于时代和文明进程的深沉思考。

